

第五章 結論

「那些寫歷史的人有修正的權利；
但創造歷史的人卻只有一次機會。」

格言¹

東京灣事件之後，華盛頓時間 8 月 4 日夜間，詹森總統下令對北越特定目標進行報復性轟炸，但在 1964 年年底的總統大選前，這次轟炸只算是一件單獨的攻擊活動。隨著北越對在南越的美國人發動愈加頻繁的恐怖攻擊以及發現南越政局仍舊缺乏穩定度後，軍方籲請總統做出更進一步的回應，詹森終於決定在 1965 年 3 月，發動代號為「滾雷」的轟炸，對北越進行系統性的空中攻擊。1965 年 4 月，詹森總統同意調派軍隊，直接參與地面戰鬥。至此，美國地面部隊便直接參與了戰事。

美國的越南派兵計畫

事實上，美國派兵前往越南的最初計畫可以追溯到 1950 年代，美國介入法國與「越盟」的戰爭時期。²1952 年，在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中曾認真思考過是否要以八個師的美軍取代法國進行印度支那的戰爭，但最後被陸軍參謀首長李奇微 (Matthew B. Ridgway) 反對而作罷。在那之後，派兵越南的提議，也時常出現，包括時任甘迺迪總統的特別軍事顧問泰勒，在 1961 年自越南返國後，曾向甘迺迪提出派「軍事特遣部隊」，包括步兵與工程師，前往南越三角洲地帶進行水災救援行動，表示這些部隊也可以在必要時從事戰鬥活動，可當成日後增兵的先遣部隊。³

在 1961 年談論派兵議題對甘迺迪來說為時尚早，但他依然派人制定「在各

¹ 原文：“Those who write history have the gift of revision; those who make it get only one chance.” From Larry Berman, *Lyndon Johnson's War: the Road to Stalemate in Vietnam* (New York : Norton, 1989), p.202.

² Alexander S. Cochran, Jr., “American Planning for Ground Combat in Vietnam: 1952-1965,” in Lloyd Mattheews and Dale Brown, eds., *Assessing the Vietnam War* (Virginia: Pergamon-Brassey's International Defense Publishers, 1987), p.81.

³ Alexander S. Cochran, Jr., *op. cit.*, pp.83-84.

種意外下使用美國武裝部隊的準備計畫」，並強調這仍然是越南人本身的戰爭，美國不過扮演有限的輔助角色。

從 1963 年 11 月到 1965 年 7 月，詹森對於處理越南政策時而主動積極，時而被動保守。他所採取的一系列實施步驟，有的是細微末節，有的卻是重要關鍵，最後使得戰爭變成完全由美國人一手包辦的事務。⁴不管後人怎麼探究過去杜魯門、艾森豪與甘迺迪的越南政策，或提出假設問題，若甘迺迪還活著的話，他是否會從越南撤兵？到最後，必須做出最後抉擇的——到底由美國接管戰事的進行，或者接受西貢政府政軍上的潰敗——依舊是詹森。

研究成果

從協助的角色到親身參與，美國越南政策的轉變歷經無數次的高層會議與複雜的決策過程，本文僅探討 1964 年前後的美國對越政策。茲就前面章節對東京灣事件及美國對越南政策的研究，歸納出以下數點：

- (一) 雖然過去許多官方文件提出證據表示 8 月 4 日的確發生了北越第二次攻擊的事件，但在分析美國官方在 2005 年 11 月份、2006 年 5 月份所解密的檔案及學者研究後，對於 8 月 4 日東京灣事件究竟有無發生，可以得出三項研究結果：1. 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官員在第一時間譯碼錯誤，卻不曾糾正。他們可能馬上就發現事情並非最初所翻譯的那樣，但卻選擇繼續隱瞞下去；2. 竄改攔截通信內容的時間；3. 故意選擇性的引用情報內容。也就是說，並沒有所謂第二次攻擊美軍驅逐艦的行動發生。
- (二) 雖然透過信號情報，可以證明第二次東京灣事件並無發生，但在 8 月 4 日當天，在接獲從東京灣所傳回的攻擊訊息到詹森總統宣佈對北越進行報復性轟炸這段時間，自總統到其幕僚經歷數小時的聯繫確認，使美國官方在當時確信北越的確發動了該次攻擊事件，迫使美國做出反擊。

⁴ Robert D. Schulzinger 著，席代岳譯，塵鬥的年代—1941-1975 年間的美越關係，台北：麥田，2001 年，頁 168。

- (三) 東京灣事件最主要的影響在於使美國民心產生變化，人民對美國在越南的角色產生認同，進而使政策推動更為容易；可說是美國越南政策改變的催化劑，間接地改變美國之後的越南政策。
- (四) 由於南越政局自 1964 年開始，不穩定的情況愈加嚴重，共黨份子滲透活動也愈加頻繁，加上美國中情局、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等政府機關悲觀的評估，詹森政府開始制定對抗北越的軍事行動計畫。
- (五) 東京灣決議案提前於 8 月向國會提出，在魯斯克、麥納馬拉及總統本人的保證之下，國會並未將其視為對北越宣戰的決議案，而是視為支持詹森總統的方式。決議案事後成為詹森政府擴大戰事的依據，乃是議員們當初始料未及之事。
- (六) 河內在東京灣事件後瞭解美國有意直接對北越發動攻擊，使其也加速升高戰事的準備。

要想從單一的東京灣事件，試圖解釋美國介入長達 20 年之久的越戰政策，並非易事。畢竟，美國之所以介入越戰，除了冷戰的國際因素之外，也還有複雜的國內因素在其中。這些因素包括總統選舉的週期性與政府機關的強制性，都能夠支配戰爭運行方式。⁵在此軍事外交史的研究中，發現政治層面的影響力甚至大過於軍事層面的因素；特別是對於內政議題較外交議題更感興趣的詹森來說，照顧好國內選民的生活比關心地球另一端人民的生活或許來得更為重要。

若沒有東京灣事件，美國是否會選擇其他事件以升高越戰局勢？

歷史學家研究越戰時，發現在 1964 年下半年裡，一共發生了四件意外使泰勒大使及其他幕僚認為這或許是轟炸北越的適當時機。第一、三及第四件意外美軍都確確實實地受到攻擊，分別是：8 月 2 日北越對美達克斯號的攻擊、11 月 1 日對邊和空軍基地的攻擊，以及 12 月 24 日對西貢美軍住處的攻擊。⁶透過第三

⁵ Robert D. Schulzinger 著，席代岳譯，前引書，頁 421。

⁶ Edwin E. Moise, *Tonkin Gulf and the Escalation of the Vietnam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章所檢視過的歷史資料可得知，所謂第二件意外：8月4日對美達克斯號及透納喬伊號所發動的攻擊其實是一場幻覺。但詹森總統卻寧願放棄利用那些真正發生過的意外，而選擇一個從一開始就疑點重重的「意外」。

但若從總統的角度來看，8月4日的攻擊的確是可作為反擊的一個合適理由。當第一次得知北越對美軍驅逐艦發動攻擊時，美國尚未確定此次行動是否為擦槍走火的意外，若貿然回應，可能會導致北越更為激烈的行動。以當時情況來看，根本無法預期北越下一次攻擊的時間，若認為之後的事件較適合採取反擊，則只不過是後見之明的看法，無法以當時的情境來看事情的發展。在無法預知未來的情況下，以當時現有的條件做出回應，相信是每個決策者都會有的判斷。

利用東京灣事件作為轟炸北越、提高戰事的理由，可說是師出有名。雖然自1960年起，越共與在南越的美軍不斷有衝突發生，但美國始終找不到證據證明是由北越在背後主導，1962年至64年所發生的衝突事件皆為此種形態，不足以支持美國出兵；但1964年的東京灣事件，是北越在北緯17度附近挑釁美國，使美國終於找到足夠證據，使其能夠進兵北越。上述所列舉的其他三件意外，皆為北越所發動的攻擊事件；可以說，若沒有東京灣事件的話，美國仍會利用後兩項襲擊事件，來作為升高戰事的依據。

對美國政府的評論

過去研究越戰的學者大多認為詹森政府故意欺騙國會議員及美國大眾，使大家相信的確發生了8月4日的攻擊事件。但從最新解密的檔案及最近學者研究中發現，第一線面對敵人的美國軍人在發現事有蹊蹺之後，仍選擇繼續隱瞞，使總統及幕僚在發動報復攻擊時相信的確發生了攻擊事件。過去總認為對東京灣事件的真偽應該是由詹森總統及其幕僚負責，是美國「故意製造」事件，以尋求國會及人民的支持。但藉由本項研究發現，在華府的官員，只能被動的接受由第一線官兵所傳回來的消息，在無法親自獲得確切的情報之下，他們必須選擇相信下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p.254.

屬所回報的事情經過。

從許多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出，前往越南視察的美國官員，或是駐守當地的軍官，皆認為自吳廷琰兄弟被暗殺到 1964 年的這幾個月之間，是南越局勢最為不安的時期。在美國對越南投入許多龐大資源後，若北越在這段危急不安的時期，趁機加強滲透，甚至推翻南越政府，將會使美國自 1954 年以來的努力付諸流水。

檢視東京灣事件前後的美國政策可看出，對北越的報復性攻擊絕對不是在危機發生時才突然制定的。華府能在下達命令的六小時後，立即進行空中轟炸，這乃是因為先前已有類似的計畫擬定好、可選擇的目標表已備妥的緣故。

美國的越南政策並不能以單純的對或錯來檢視。以法理面來看，美國認為北越長期以來違反 1954 年所簽訂的日內瓦協定之內容，將共黨份子以各種方式滲透至南越及其他鄰國、支援南越的叛亂行動，身為支持日內瓦協定（美國並未簽署）的一國，美國絕對有義務幫助南越成爲一塊不受共產黨控制的區域。

魏摩蘭將軍在其回憶錄中曾提到，在 1965 年時美國就應該撤出越南，當時的越南人之間彼此爭吵不休、行政無效率、意見紛亂、政變頻繁。魏摩蘭認為若美國是因爲失望而撒手不管，世界上少有人會歸罪於美國。但即使在那樣喧擾的情況下，美國仍未放棄其承諾，使其能夠光榮撤退的時機已消逝不在。⁷

回顧與展望

在研究越戰歷史時，可發現許多對於戰爭的研究皆是著重在事件本身，或著重於美國單方面政策轉變的過程，很少以研究美越兩國的關係來衡量戰爭的走向。在當時的美國政府內部似乎也是如此，麥納馬拉曾回憶到，政府內部缺乏專精於東南亞歷史、政治背景，同時又具備政策經驗的專家，使美國決策者在常缺乏對於越南歷史的認識下，只將政策選項放在全球的評估下來衡量，並無考量到

⁷ Westmoreland, W. C. 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魏摩蘭回憶錄(上)，台北：黎明，1980 年，頁 130。

地區的情況。

歷史學者史丘欽格(Robert D. Schulzinger)曾經說過：

要是美國領導者沒有把每項國際事件皆與冷戰聯繫的話，將不會出現這場在越南的美國戰爭。⁸

若是東京灣決議案沒有造成美國大規模地介入越戰，此事件將不會成爲越戰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也不會有人在意此事件之真偽。或許有人認爲，在越戰都已走入歷史長達 30 個年頭後，現在再去探究一件 40 年前的往事又有什麼意義？就如同筆者在本文一開始所提及的，現在許多學者與政策分析家，都拿東京灣事件與 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相比較。研究過去告訴我們，歷史實際上是會重演的。如何避免過去的錯誤，以後人的眼光看來或許並不困難，但決策者當時的角色及其思維一定有其道理。

時至今日，美國國家安全局仍陸陸續續公布有關東京灣事件的解密檔案及學者們的文章，從陸續公布的檔案中發現，不同學者對於同一份檔案資料的解讀都不盡相同。也就是說，到今天爲止，對於東京灣事件的真相尚有部分爭論的空間。對研究歷史的我們來說，原以爲確定的結論現在受到挑戰，難免有些許挫折；但我們卻需檢視更多的資料來加以佐證、使用更多的檔案互相配合檢視，得出歷史的真相。的確，檔案本身並無法告訴我們事情的真相，一切皆需要我們細心地解讀、分析，這也是身爲歷史研究者所背負的任務與使命。

對於越戰，我們至今尚有許多疑問與假設，但我們無法回到過去，評論當時政策的錯與對，只能期盼藉由更多越戰檔案的解密，讓其他過去曾被錯誤解讀，或尚有爭議的歷史事件，能夠回歸其原本的面貌，釐清事實的真相。

⁸ Robert D. Schulzinger, *A Time for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41-197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29.